

方剂史上的三种组方模式探讨

李崇超*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 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城仙林大道 138 号, 210023)

摘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方剂有不同的组方模式。通过对中医学历史脉络的考察可知, 方剂组方模式经历过法术思维模式、数术思维模式和药物功效模式三个不同的阶段。经方与时方存在着组方模式的不同, 君、臣、佐、使理论产生于数术思维模式之下, 三种组方模式对方剂学的发展都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 组方模式; 方剂; 配伍理论; 法术思维; 数术思维; 药物功效

方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工具之一, 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选择适当的中药, 按组方原则, 酌定用量、用法配伍而成。方剂的组方模式是指在方剂的配伍中整体的指导思想和方式。在结合中医学的发展史进行考察之后,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即在近现代之前的方剂的组成, 存在着不同的组方模式,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法术思维组方模式、数术思维组方模式、药物功效组方模式三种。

1 法术思维组方模式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来讲, 方剂的发生离不开人类主体的文化构建过程。法术思维是一个人类学上的概念, 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极为普遍的思维方式, 法术思维是一种意愿思维, 就是按照自我中心逻辑将主观幻想的因果关系加于客观现实的一种思维模式。比如在原始的狩猎舞蹈中, 就把自己获得猎物的愿望用身体语言表达了出来。后来法术活动同语言相结合, 产生了新的形式——咒语, 即在法术思维的高级阶段产生了主体用词语等来实现情感意愿内容、操纵和控制自然的法术手段。这一点在甲骨文中就有体现, 甲骨文中的祈雨等的卜辞就具有这种法术思维的性质。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 很多植物就和咒语配合在一起用来治病。美国学者周策纵注意到了远古巫医传统与《诗经》之间的联系, 他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对《诗经》中动植物药的治疗作了独特的考证和阐释, 从巫药的用途去看《诗经》中的

植物名, 指出《王风·采葛》中提到的葛、萧、艾三种均为巫医必用之药^[1]。周策纵的论述已经谈到了巫医治疗与药物治疗的统一, 叶舒宪指出, 这“对于重新认识《诗经》中潜存的咒术医学因素有重要的启发作用”^[2]。不仅仅是在中国, 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就指出了早期人类使用这些自然药物和那种法术思维的合一, 其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 “动植物不是由于有用才被认识的, 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是有用的或有益的, 正是因为他们首先已经被认识了”^[3]。这里所说的认识, 即包含了法术思维的认识, 所有的实践得来的知识也被纳入一种法术思维的体系之中。早期的药物使用其实已经纳入了一种巫术、心理和药物功效三个作用力的互动模式之中。

中药的使用经过了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法术思维时期, 一直到后来医学渐渐进步, 这种法术思维还有一定的位置。正如《五十二病方》中的祝由与药物的杂糅, 比如《五十二病方》中治尤(疣)的方剂“取敝蒲席若藉之弱(弱), 绳之, 即燔其末, 以久(灸)尤(疣)末, 热, 即拔尤(疣)去之(一〇二)。一, 令尤(疣)者抱禾, 令人噉(呼)曰‘若胡为是?’应曰‘吾尤(疣)’。置去禾, 勿顾(一〇三)。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骚(扫)尤(疣)二七, 祝曰: ‘今日月晦, 骚(扫)尤(疣)北’。入帚井中(一〇四)”^[4], 其中可以看出方位、咒语、动作本身还是“方”的组成内容。《神农本草经》中也有“杀鬼精物”“杀百精老物殃鬼”^[5]的记载。也就是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14)

* 通讯方式: lcc311jw@163.com, 13913881791

说,一直到《五十二病方》和《神农本草经》的阶段,还可以看到很多法术思维的遗存,也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2 数术思维组方模式

2.1 数术思维与医学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法术思维”过渡到“数术思维”,巫师这一阶层逐渐演化,一部分形成了后世的方士,数术思维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医学中来。中国独具特色的“象数思维”也是“数术思维”的一种。数术思维虽然也掺杂了很多迷信思维,但是相对于法术思维来讲,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也包含了很多有科学内涵的内容。如果说法术思维是一种意愿性思维的话,那么数术思维就是借助自然现象和特征及其组合运用的思维。

数术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驳杂的,从其名称的多样性中亦可看出。数术和“方术”“方剂”“技术”等一直混用,《汉书·艺文志》中的“数术”就囊括了相当多的门类,如“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之所以这么多的门类能够统一于“数术”之下,其实也说明了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处于当时的那种知识形态之中,往往用数术的思想统摄这些自然知识和技能。

《黄帝内经》中数术思维就占有很大比例,比如其明确指出了“法于阴阳,和于数术”。数术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数字的使用,如《素问·三部九候论》中的“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灵枢·九针十二原》中的“始于一,终于九”,就是数术思维中“象为主,数为用”的数字抽象象征的体现。《黄帝内经》中还多次提到“不及者其数生,太过者其数成”,《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木曰敷和,敷和之纪,……其数八”;“火曰升明,升明之纪,……其数七”等,这些都表明,《黄帝内经》中数术思维模式是贯穿在其中的,甚至《黄帝内经》的医学学术的高度也受到了数术思维的某种推动。

这一时期方剂的组方模式也受到了数术思维的影响,《黄帝内经》中君、臣、佐、使的理论显然就是一种数术化的理论。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这里对方剂的君、臣、佐、使已有了明确的味数规定,可见

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是产生于数术思维模式之下的。

作为早期的“科学形态”,数术思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建民指出“若只强调经验,周秦医学的经验为何足以跃升为体系性的医学呢?是否有经验之外的因素如意识形态促成的呢?”^[9]我们可以认为,从《五十二病方》中较为杂乱的方剂飞跃到非常成熟、疗效卓著,并为后世医家所推崇的经方,数术思维参与了这种进步的形成,而不仅仅是靠经验。当然数术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长期积淀的经验,是对经验的一种提炼。

数术化的古典医学将生命与天地的律动连接了起来,将身体的分类与天地的分类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一种合理性与科学性,在今天来讲也是对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考内容。

2.2 数术思维在经方中的体现

数术思维组方模式最集中的体现可以在敦煌出土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中方剂的配伍看出。

《辅行诀》中没有单味药的功用,只有各种药物的五味与五行的属性记述。其中五行学说不仅作为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观念,而且体现在整个配伍之中,成为联系药物和人体之间的纽带,避免药物选择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辅行诀》中是这样对“诸药之精”进行五行、五味的划分的“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味咸皆属火,旋覆为之主,大黄为木,泽泻为土,厚朴为金,硝石为水;味甘皆属土,人参为之主,甘草为木,大枣为火,麦冬为金,茯苓为水;味酸皆属金,五味为之主,枳实为木,豉为火,芍药为土,薯蓣为水;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白术为土,竹叶为金。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诸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经云:主于补泻者为君,数量同于君而非主故为臣,从于佐监者为佐使”^[13]。

因为有了这样的五行配属,《辅行诀》中对五脏“苦欲补泻”的配伍运用十分严格,在《辅行诀》中五脏苦欲补泻是这样的“肝: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适其性而衰之也。心:以咸补之,苦泻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以甘补之,辛泻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以酸补之,咸泻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开腠理以通气也。肾:以苦补之,甘泻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至津液生也”^[10-12]。

这种苦欲补泻和《黄帝内经》中的有所出入，相比较而言，《辅行诀》中的更为合理，这大概与目前通行的《黄帝内经》在传抄中出现错误有关。在《辅行诀》中的方剂配伍中，确实是严格地按照这种规律来配伍的。比如五脏大小补泻汤，补某脏者，则用该脏之本味，如小补肝汤中，用的第一味药是桂枝，正好是木所对应的主药，符合“主于补泻者为君”理论；而泻某脏者，则用克该脏之味中的同一五行属性的药物，如小泻肝汤中，用的第一味药是枳实，是金类药物中的木药；某脏急食的药物，则用该脏所克之味，如甘苦急，急食甘以缓之，那么肝所对应的土类药物为甘，正好为木所克。全部五脏大小补泻汤都是用这种理论所配伍，十分严谨。

《辅行诀》中另一个体现数学思维的方面就是五脏补泻体用图（原图无名，钱超尘先生命名）^[16]。《辅行诀》中指出该图包含了经方的配伍规律，曰“陶隐居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根据《辅行诀》中的记载“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土，酸属金，苦属水”；辛生咸，咸生甘，肝生酸，酸生苦，苦再生辛，形成五味五行相生循环。数学中的阳数七、阴数六的观点，也在该图中体现的十分严谨，如除大补心汤为六味药之外，肝、心包、脾、肺、肾四脏的大补汤药味都是 7 味，而大泻汤的药味都为 6 味，从数字上体现了《辅行诀》中提到的“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的规律。

《汉书·艺文志》中对经方家的解释为“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从《辅行诀》中所记载的经方配伍规律来看，《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经方特点还是比较准确的，如“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中的水火，可能就是五脏补泻体用图下的“水数”和“火数”的意思。

《伤寒论》中也有大量数学的内容，其中的方剂组成也受到数学的影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方：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此方的配伍比例与数学有着密切关联。太阳中风，从卦象上看，是上翼下坎，即风水涣卦。外为木气，内为寒气，故桂枝、芍药、生姜以木数（三）解肌表，甘草大枣以火数（二）治内寒，内外相合，邪气得去，

机体亦安和^[17]。

从《辅行诀》和《伤寒论》可以看出，经方体系的形成和数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方剂的解读要结合当时数学思维的特点。

3 药物功效组方模式

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药物使用经验不断积累，本草学越来越发达，各种药物的功效总结得越来越清晰，中药学的理论也越来越完善。因此，后世配伍方剂经常是根据既定的药物功效配伍，这一组方模式成为现在较为通行的方剂组方模式。

《神农本草经》之后的本草学著作取得了一定进展，至唐代《新修本草》时收药就已达 844 种，其中 114 种是新增加的。唐代开元年间陈藏器搜集了《新修本草》的遗漏，又编写了《本草拾遗》，随后又有各种各样的本草学著作问世。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成为药物学的集大成者。《本草纲目》共收入药物 1892 种，每一味药物均按照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为药物的临床使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药物归经理论的形成可以说是药理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为推动方剂的组方模式向药物功效组方模式发展提供了铺垫。同时大量的医家将自己的用药体会记载下来，这些都为临床上采用药性功效配伍提供了基础，而现在的临床组方思维都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4 三种组方模式的讨论

三种组方模式互相递进，并不能截然分开，也很难做出准确的时间阶段划分。如后世很多医学家在组方的时候往往也有很多论述数学的内容，甚至法术思维也未完全离开中医学的领域。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种思维模式在方剂构成上的倾向性却是非常明显的。明确历史上存在三种组方模式，对于理清方剂的组方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4.1 经方与时方的理论差异与组方模式改变有关

我们用目前通行的方论去解释经方，往往会有很多难以解释的地方，是方剂组方模式的变迁所造成的。

早在清代就有医家注意到了经方与后世方的组方模式不同，如陈修园《金匱方歌括·凡例》曰：“伤寒、金匱诸方，皆出伊圣汤液经，说见艺文志。其方通造化之微，不可以寻常寒温补泻之说以窥测之”^[18]。徐灵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治方之法不传矣，

此医道之一大变也”^[8]。他指出了后世的方剂主要是“专在于药”，也就是说，后世的方剂组方模式已经偏向于药物功效组方模式。

4.2 组方模式的变迁与君、臣、佐、使理论争议

学术界对方剂的君、臣、佐、使理论也一直存在争议，君、臣、佐、使到底是组方原则还是方剂结构，君、臣、佐、使在方剂组成中到底有多大的指导作用，都是有争议的问题。如刘兴隆等^[9]指出君、臣、佐、使并非是方剂的组方原则，而仅仅是组方结构；冯永等^[10]认为，某些方剂在组方配伍上难于用该理论自圆其说，让初学者无法理解其作为组方理论的重要价值，因此，君、臣、佐、使理论常常被认为其仅仅只是用于诠释方解的理论，致使该理论在临床实践中不能产生其应有的重要指导作用。

其实从君、臣、佐、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是属于数术思维模式阶段，其本身有着数术思维的特点，如君药和臣药的数量有着严格的数术化的配比，如在《辅行诀》中的方剂，君、臣、佐、使的关系就十分清晰，药味数量也符合君、臣、佐、使的规定。而后世的方剂组方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君、臣、佐、使理论在后世方剂组成中的牵强性就显现了出来。

综上所述，三种组方模式均在方剂发展史上发挥过作用，尤其是数术思维模式与药物功效模式产

生了大量优秀的方剂，丰富了中医临床，开展对三种组方模式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方剂组成背后的“元语言”，丰富方剂组方理论，有利于发掘古方和创制新方。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诗经的文化阐释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 241.
- [2] 维列·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M]. 李幼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2-13.
- [3] 严健民. 五十二病方注补译 [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62-63.
- [4] 李建民. 发现古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5.
- [5] 张大昌, 钱超尘.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 [6] 龚轩. 伤寒论中的术数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7] 陈修园. 金匱方歌括 [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6: 9.
- [8] 徐灵胎. 徐灵胎医学全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151.
- [9] 刘兴隆, 邓中甲, 贾波, 等. 君臣佐使组方原则质疑 [J]. 辽宁中医杂志, 2008, 35(1): 43.
- [10] 冯永, 杨卫平. 对《方剂学》君臣佐使理论的定性思考 [J]. 中医杂志, 2006, 47(1): 61.

Discussion on Three Kinds of Formula Mode in the History of Prescription

LI Chongchao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The component of prescription had different formula mod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Chinese medicine history, formula mode of prescription experienced three different stages, i. e. magic art thinking, numerology thinking and medical efficacy thinking. The formula mode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urrent prescriptions. The theory of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guide came from numerology thinking mode. Three kinds of formula mode have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prescriptions.

Keywords formula model; prescription; compatibility of medicines theory; magic art thinking; numerology thinking; drug efficacy

(收稿日期: 2015-04-17; 修回日期: 2015-07-08)

编辑: 黄 健